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a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4-12-1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金, 光☒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2352

从国家 - 社会的关系考察文化的政治学 —— 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概观¹⁾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a

金 光亿 (李海燕译)

KIM Kwang Ok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culture is in a constant process of making and re-making itself, rather than in a crystallized structure, I assert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China's culture in the contexts of competition, conflict, compromise, and even conspiracy between/among various powers within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a society, like China, that has a long history of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s under an almost absolute state institute of power, culture and its various form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 anthropologist, by positioning his/her-self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people, can experience more directly and vividly encounter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as well as different responses among heterogeneous groups of a society to the state power.

Instead of the adaptive (functional) model and intellectual (evolutionary) model, my study would focus o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attempt to understand how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surrounding the question of space and power.

1. 文化的政治学
2.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3. 中国研究中的国家 - 社会
4. 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中的国家 - 社会范式
5. 方法论上的问题

1. 文化的政治学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 我们努力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部分和侧面进行考察, 以此提出其现实意义。但是, 归根结底, 所有的现实都与国家这个巨大的理念和权力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点

无法否认。也就是说在中国研究中，必须考虑国家的存在。笔者非常关注由国家定义的世界和国家组成部分的人们（可以被称为国民，公民，市民，人民，大众，民众等多种概念性用语）所创造和实践的世界之间产生的文化实践。笔者把社会现象看做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的过程，并认为这样的文化实践通常是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之间发生的政治过程。具体地讲，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把焦点放在社会制度的形式和实践方式上，然后考察它与国家的理念和社会习俗之间发生的各种紧张和竞争等情况；另一种研究是通过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等人们头脑和心理的认知世界和感情体系的研究来分析国家和社会之间发生的竞合。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前者从实践的角度上观察国家在革命和改革的名分下如何对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经济（合理性）以及思想（宗教）等社会制度进行改造的，社会对此又做了如何的反应。而后者则研究国家如何利用国民素质论、精神文明运动等名义，来改造人们（国家成员）的意识，以及人们的意识反应。当然，这两种方法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有机联系的。

如果用前国家（pre-state）阶段的社会为模型而发展的20世纪初西欧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象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文明的复合社会时，便会感到有局限性。20世纪初，人类学主要以非西欧社会，特别是非洲，中南美，西南太平洋，亚洲高山地带等的部族或族群（ethnic group）作为研究单位，分析其内部结构和成员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体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特征及其功能。因此，人类学者在研究族群社会时往往只聚焦在族群社会本身，注重进行寻找文化特性的蝴蝶标本式调查（butterfly collection）和民族识别研究，而忽略了其上位级社会。其结果是，把每个研究对象视作孤立的文明或文化的孤岛，造成了视野的“近视”。但是，后来发现看起来极为孤立的事物，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于与相邻的地域、社会和民族团体相互链接的网络之中。而且认识到大部分的社会都是作为国家体制的构成单位而存在的事实。对中国56个民族团体进行个别研究，阐明其民族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研究，对记录和再生产逐渐消失的固有文化是相当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些研究的问题在于，容易导致人们把少数民族社会视为没有历史、没有政治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构成单位，是在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体制中的相互关系中，不断相互作用、经历着变革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把视野转向国家和地域社会或者民族社会间的各种关系所产生的文化的现实上。政府或统治者通常提出国家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的修辞（rhetoric），要求国民（或者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确立和持续尽到义务。不过，共同体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和同一的文化组成的。实际上，在国家共同体里存在着不同倾向的多种势力，反复进行统一和解体的过程。不过，人们凭借却从同一性走向统合的想象和信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是一个同一性的共同体的认识（参照Cohen 1983）。政治是生产使人们安居在想象的现实中的世界观的技术过程（参照Anderson 1991）。所以国家共同体是被象征地构建（symbolically constructed）或者被想像的（imagined），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process），作为流动的（floating）或者非定型的（ungrounded）理想的共同体。

这即意味国家共同体和地域社会之间在规范、正当性、正义、伦理、道德等原则或者标准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国家和社会之间便产生了竞合、妥协、共谋等多种关系。然而国家主义者却

用怀疑的眼光把这种多样关系看成是瓦解国家的统合与单一性的因素，实际上这种竞合与不一致的关系正是文化实践的源泉，而社会的变革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分析这种文化实践的过程和意义。

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框架正是从这种认识和视野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把国家和社会看作二元对立 (dyadic confrontational classification) 的观点值得注意。一个社会作为国家的构成成分，归属于国家，但与此同时也是构成国家的主体因素。从而，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是行驶向同一个方向，而是形成双向影响力，处于彼此竞争的同时也是互相妥协的甚至共谋的复合型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用研究国家理念和权力与传统社会之间的竞争、矛盾、妥协、共谋的政治过程和实践的手法、来取代把文化视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机制、经济体制 (适应模型)、技术体系和世界观 (智慧模型 / 进化论模型)。

2.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一般来讲，社会是指人们以传统和习惯组成的文化体系，可以感知到的生活世界。国家则是以国家的理念和法律体系、制度装置、非人性的理性和合理性与人民所持有的传统相竞争或妥协。在公共权力，公共的 (the public)，正式的 (official) 或者合法的 (legitimate) 等修辞的制度装置的文化权力和与此相对的私人的 (the private)，个人的或个别的 (individual—需要与西欧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念区分开来)，地方，习惯，还有民间传统的修辞的领域之间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的两者之间的关系。

1980年代欧洲人类学者开始了对自己国家的人类学研究 (anthropology at home) 之后，人类学界对国家的关心逐渐凸显起来。这是因为本土人类学者 (native anthropologist) 以研究自己的国家为课题 (往往以本土或反省的命题来议论)。大部分人类学者是西欧人，他们的生活世界是存在着国家体制的社会，因此，他们自然地意识到用从前国家阶段的社会研究中开发出来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西欧社会是有局限性的。从本质上来看，前国家阶段的社会与国家社会，在社会生活的原理与文化属性上看不出有很大的差异。阐明人类在本质上相同的，是之前的人类学也是今后的人类学的课题，这一点也正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可以在拓宽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能作出卓越贡献之所在。然而，用他们在研究非西欧、单纯的小规模社会中积累的理论性假设和方法论来诠释国家、文明、产业社会、大规模，复合性等概念确实有根本的或者本质性的局限。

尽管人类学者们把社会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他们对社会存在于与国家相关的关系中的事实，却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至少在方法论的开发上并不积极。19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使用国家这个概念上显得相对消极。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国家和文明社会的主体，并发展其方法论，却没有关注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这大概是因为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欧洲，国家对社会无法直接行使其强大的权力，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力量较大，同时超越国家的公共领域或社会空间也比较活跃。因此他们结成欧洲人类学会，试图对欧洲的社会做更多的研究，但并没有完全使用国家—社会关系这个框架。美国在2000年旧金山召开的

AAA(美国人类学会)上以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为主要命题,提出了转换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以及转换人类学的知识有用性的新方向。这使197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从注重社会结构和功能的非政治、非历史的研究倾向,走向关心个人的战略与选择(参照 Ortner 1984)。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学者把眼光转向通过个人来研究不同文化的过程以及文化书写过程中所碰到的方法论上的苦恼,人类学从此开始了文化批评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s culture critique)和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新篇章。不过,从结局来看,人类学因此变成了知识孤岛(ghetto,与主流社会隔绝的贫民区),人类学界反省人类学知识的有用性和伦理性。

200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开始流行公共(public)这个词汇,上述的动向逐渐形成主流。不过,严格地讲,形成主流的并不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发生的文化实践或把文化实践看作国家和社会间发生的关系,而是在国家和地方层次产生的公共领域—公共权力的公共领域和由社会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的关系。因此,私人的、非公共力量形成的非政府的公共领域与政府掌握的公共领域如何竞争、妥协乃至协作便成了如今人类学新的研究倾向。人类学对私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constructed by unofficial or non-governmental elements)与国家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的研究不仅为政治社会学里流行的NGO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提供了民族志的事例,并形成了社会科学的新潮流。

在西欧和美国的人类学界里,虽然他们关注公共领域,但是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当作社会研究的重要的理论方法的倾向并不强。而在包括中国和其它亚洲的许多地区里,特别是在像韩国这样儒教文明的传统一直被持续地再生产到现在社会里,国家定义社会,并做出道德评价的倾向很强。因此,人类学需要注重研究市民的公共领域或公共舆论与国家话语和矛盾、紧张、竞争、对立、妥协等多种过程。进入1990年代以后,西欧的政治社会学者们在非西欧社会,特别是在新生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研究里重开了对国家(state)的讨论(Shue 1988, Evan et.al. 1985, Oi 1989)。人类学者的讨论集中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或者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的问题上。在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中表现出了多种取向,学者的兴趣焦点在大众文化(public culture)和由市民运动的抬头而引发的国家权力的解体以及处于解体危机的国家(perilous state)或者脆弱的国家(vulnerable state)的现实上。这种尝试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权力操作的理论流行,是福柯 Foucault 的后结构主义中暗示的国家的阴险和巨大暴力的权力结构的阴影支配着个人的理论的一种翻版。而在其后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潮流中则出现了更新的领域。这说明人类学者们对社会(society)的研究焦点有了新的变化。2000年代以后,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抬头成为抵抗国家权力的力量(power)的研究倾向进一步发展。大众(这个词汇被翻译成 populace, mass, subaltern 等多种词汇)、文化、以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成为人类学关心的关键词的代名词,并且与各种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相链接。它与最近的全球化议论相结合,着眼于大众文化超越国家的移动或者相互渗透。这种超越国家或者国境的新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流行趋势。

Scott 的关注行为者的抵抗论(参照 Scott 1985, 1990)为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手段。由西欧学界主导的对非西欧文明社会的研究,确立了近代化过程最终是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过程的主体, 把国家和社会放在对立关系中, 他们把所谓民间、民众、大众、农民看作与国家对立的领域, 把两者间的紧张和矛盾视为历史的原动力。看起来, 国家和社会围绕着文化存在着矛盾, 并进行着竞争, 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之间也有妥协和共谋。我们往往把传统认为是农民的, 并且把分析的焦点放在国家对它的评价和干涉上。但是, 实际上传统有由国家规定和定义的官方的传统 (official culture/great tradition) 和人民的非正式的日常生活里实践的私的传统 (un-official culture/little tradition), 人类学需在这两方面的空间里分析文化现象。我们往往只着眼于传统本身, 就好像它是从来就有的, 并把传统当作被所有的人统一认识和实践的, 是超越阶级或非阶级的话语。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对事件 (作为发生的社会事实的事件) 的具体主题的关注。也就是说构成一个社会的人们有着多种取向, 不同阶层的人对同一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定义, 并赋予不同的意义。

3. 中国研究中的国家—社会

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里, 国家的存在对任何课题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国家—社会间的多样关系的研究框架也就特别重要。在中国, 国家权力以革命的名义深深地渗透于个人的私人领域里, 因此个人无法从国家的理念和公共权力中享有自由。一般来讲, 中国研究者们通常以在国家的主导下人民世界的变化为前提, 注重国家的政策、理念、制度、政治性文化运动的展开等等。重视历史过程的学者们重视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所经历的体制变革的三个阶段, 即从传统社会经过民国时代 (辛亥革命) 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入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的过程。人类学通过民族志的调查对上述过程进行了观察, 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如从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走向脱集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导入引发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上的变化, 农业社会向产业社会的转型, 都市化过程, 还有人们在价值观和思想上定义为“现代化”文化上的变化等进行了人类学研究, 并取得了很多成果。

根据研究者的特点, 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研究有下列几种特征。90年代初发表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 这是由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好奇心而引起的。他们观察了社会主义体制如何铸造人民的感情体系 (Potter and Potter 1990), 并使用了“细胞化”这个概念来揭示个人如何直接隶属于国家 (Siu 1989)。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国家的力量与民间领域里的各种挑战、抵抗、竞争的文化。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以竞争、共谋等多种形式展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运动中的人民的、私的领域, 特别是理念领域里, 国家和民间传统之间的紧张和竞争的互动性的研究 (金光亿 1993, 2000)、围绕历史经验的官方记忆与私人记忆的竞争 (Watson ed, 1994), 或者把传统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资源再生产的现象的研究 (Yan 1997, Yang 1994, Kipnis 1997)、对革命和改革的实践的民族志 (金光亿 2000)、对文化领域里革命表象的研究 (韩敏编 2009) 以及在国家的空间里构建流动人口的私人空间 (Li 2001) 等等, 这些研究论述了革命和国家的巨大权力如何缩小了个人或社会空间并铸造了历史过程, 同时也记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 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空间如何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战略性的抵抗。

毛泽东发动的革命运动强化了国家的神圣化和绝对化的教育，它既可以解释为是国家权利的绝对化和公共领域的极大化的合法暴力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私人领域及社会习俗的空间极小化和否定化的过程。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把研究焦点应该放在上述过程里采取的多种制度装置的变化上以及把这些制度装置正当化而进行的改造意识结构的文化运动的分析上。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即改革开放以后的脱集体化过程给社会空间还有私人领域带来的活性化的见解。当然这种解释是常识性的，这种解释是以脱离革命（关于这句话是否妥当，还有议论的余地。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在继续，只不过在方法上有所修正），即脱离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引起的个人领域和私的空间的极小化为前提的。

阎云翔（Yan 2003）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私的领域的道德和实践的研究饶有趣味。他揭示了黑龙江省某个村庄的结婚风俗风景的变化，以民族志的研究论证了国家在私人的生活世界不断扩张的观点。他不但阐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而且还补充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结果反而为个人的存在准备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空间。他提出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60年的革命过程与之前的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新的价值观、想法和模式，试图通过与过去的区别，与传统的持续划上一定界限。事实上有几位西欧学者一直在用这种延续性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国家权力的机制做深层分析。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无法忽略毛时代曾长期深入地展开了文化政治运动，如批孔运动等，把传统思想定为封建残渣，但实际上在国家统治的层次上政府又巧妙地利用了儒教文化（参照 Walder 1986）。从这种脉络来看，政府忧虑的不是传统本身的持续问题，而是传统对革命的挑战及转变为抵抗势力的可能性。那么，传统平时潜藏在下面，根据情景隐时现，政府对它或打击或妥协。适应的理论模式认为国家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明显的冲突和竞争，而是对意想不到的情况和环境作出制度装置的临机应变的实践。

此外，还有一种超越国家价值观的经济力量（power）现象的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针对个人的国家权力和优先考虑经济利益的个人战略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现象成为主要的关注对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消费领域的扩大及消费的阶层化也带来了与从前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的紧张状态。民众企图扩大私有领域，利用国家推进的开发和发展政策以确保个人利益。针对这种个人的经济战略行为的研究在不断增加，把国家权力转化为私人利益的资源，把个人看作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战略实践，或官僚主义的不正腐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压力和矛盾，在多种层次上的各种官民的共谋，欺骗和不法手段等研究也属于这类（参照 Cho 2011）。最终，经济领域成为个人和国家的竞合、矛盾、共谋的空间。

另一方面，超越国家控制的全球化消费形态和由此形成的全球现代化的实现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得到发展的中国人（至少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再也不只生活在“中国”这个地区性（local）的环境里，他们的关心超越国家。虽然他们现实中生活在中国这个地区，但是他们的想象是在超越国界的全球化的世界里。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的特征是，中产阶级的人利用国家所提供的经济领域作为资源，追求超乎超越国家的全球性空间（参照 Li 2010）。美国的政治社会学者们是这种研究的主导，他们关注全球化和市民社会形成的可能性，特别是超越国家的城市部分的社会空间的确立。

在教育领域里存在着国家层次的价值观和超越国家的价值趋向。Kipnis 最近关注“教育热”，主要探讨研究国家和父母在子女的教育空间里的共谋问题（Kipnis 2007）。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消费倾向，因父母的参与导致了过热的教育现象。这在亚洲，特别是在给教育和知识赋予特别价值的儒教传统文化社会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教育机会的开放和扩大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的官僚性权威压倒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着什么关系？教育从属于市场结构，知识商品化，市场教育的阶层化与社会的阶层化的关系，预测导致未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多种因素等逐渐成为饶有趣味的研究领域。

与全球化有关的跨境超空间的出现关系到新的多民族社会的形成问题。从义乌的国际市场和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看出来自非洲、亚洲、中东的移民劳动者和中短期居留的商人，以及国际结婚的移民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产业和经济领域里。这些国际移民是填充中国这个地域社会的新的因素，同时他们与中国人结合形成超越国家的网络社会，因此有必要观察中国这个国家如何跨出一定的领土境界，将其政治控制力走向全球化。这种出现在某地域里的多种国籍的人的存在和他们所形成的超越国家的网络有可能诱发出对所谓“中华帝国”的新的拓展或传统的天下观的想象。除了经济问题以外，关于包括家族的各种社会制度、习俗、风俗、艺术、民间信仰、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很流行。西欧的人类学者喜欢研究从前被国家的理念和道德否定的部门如何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浮现于水面上的这些现象以及开发市民社会论。在这里新的贫困阶层、农民工或流动人口与新的中产阶级一同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动力。农民和新贫困阶层试图以适应、抵抗、欺骗等多种战略，在国家赋予的环境下保护自己。特别是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国家放弃了过去的福利保障制度，“人民”这里包括当地的干部有时也作为人民的一员或稳重的家父家长参与共谋（参照 Cho 2013, Solinger 1999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革命的意义逐渐衰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焦点从农民研究转到城市非农业人口（城市人，流动人口，外国人）上，注重他们为了确保经济利益即个人的生活保障，福利以及生活安全，对国家做了何种反应（适应、妥协或共谋）。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只是改变了革命的性质和个人的社会空间，莫大的国家力量并非轻易地变化。我们如果只把眼光盯在私的领域，用个人主义、抵抗和战略的词汇来记述，就不容易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实。

比如，与注重改革开放带来的市民社会形成的可能性的政治学的研究同步，有些社会人类学研究试通过对家族生活和婚姻事例来分析个人或私的生活领域的扩大。例如，通过反对由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方式的自由恋爱，婚前性关系，婚前怀孕，个人做主的结婚和离婚等的趋势，来考察个人主义的实践或社会空间的扩大现象。不过，这些不断增加的行为所包含的深层意义和价值需要进一步阐明。恋爱结婚的增加，可以看作是由新婚姻法实现的国家的公共领域的扩大，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移风易俗和对强调道德的国家的一种抵抗形式，重要的是变化并不只在一个方向进行着的事实。个人主义或私人领域的扩大以及个别的利害关系是国家没有策化或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人民在接受国家政策和理念的同时，也利用了它并把它当作实现他们欲望的手段。上述的现象就是通过这种共谋的形式形成的。因此，不应该把这种现象单纯地解释为向市民社会的转型，而是应该解释为‘没有策化的’国家理念和社会传统不经意共谋的现象。

我们注意到针对人民的这种倾向，最近国家开始开展多种文化运动和政策，想在非经济领域里生产和控制人民的感情的运动，即文化的政治，以确保其经济利益（Kim 2008）。例如在大众流行中“爱国”取代了“革命”这个词汇。2000年代以后“爱国”和“文明论”，特别唤起“中华”的复兴和再生的大众的想象力，不断再生产爱国的理念志向和感情。现在“爱国”是国家和人民共谋的最突出的公共领域。虽然人民在日常生活里说着追求超越国家的现代性，看起来全球化即将实现，但他们在细琐的东西里容易形成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暴力性集团心理反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1）在世界观和对未来的想象方面，处于信赖关系中的国家与社会进行着竞合；（2）在对人民实际经历的经验，对赋予现实的价值和正当性的说明方面，国家和社会进行着竞合；（3）在历史记忆，表象形式与主导权方面，国家与社会进行着竞合；（4）在感情（emotion, sentiment）方面，国家与社会各有不同的关心，两者展开竞合。国家和社会的各自文化是通过上述的链接进行政治演出而形成。

适用国家—社会范式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应该是民族关系。90年代在有局限性的条件下，新一代人类学者（在美国获取博士学位的第一代）被允许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他们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侧重研究人民被隐藏的、压抑的近代化欲望以何种方式表露。

Anagnost（1997）和 Rofel（2007）等进行了对汉族社会的研究。少数民族的研究焦点在历史记忆（Muegler 2001）和认同的构成（Harrell ed. 1995, Litzinger 2000, Gladney 1991），试图通过民族志的事例研究来揭示民族认同的文化表象（塚田诚之编 2008）。实际上费孝通强调的多元一体论和文化自觉是相互冲突的主题，提供了很多辩论的资源（Dikotter 1992）。总之在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里，通过民族或宗族集团的设定来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饶有趣味的人类学主题。这也可以说是中华论和天下秩序论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是产生多种议题的研究领域。

4. 当代中国宗族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范式

对传统的社会制度变化（包括消失与再生）的关注，在宗族和家族研究领域里最多见。这类研究主要讨论传统的文化体系作为对新环境的适应机制具有的有用性或意义。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后，一些西欧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关注家族形态的变化，他们把家族作为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机制，试图通过考察家族来掌握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的变化及其特征（代表性的研究有 Davis & Harrell (eds.) 1993, Friedman 2006）。

但是，有意思的是家族与宗族研究很快就被经济组织，劳动，城市化，流动人口，消费生活等的研究所代替。日本以及韩国的一些人类学者们一直在进行对宗族与家族的研究，但逐渐成为“过去的研究领域”。而，中国人类学者的宗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部，与村落研究并列进行（参照 钱杭、谢维扬 1995，麻国庆 1999，周大鸣 等2003，周大鸣 2006，王铭铭 1997，2004，张小军 2004，聂莉莉 1992，潘宏立 2002，Gao 1999，Han 2001（韩敏 2007）等）。另一方面，历史学者的结合宗族史与地方史的研究不断在发表（参照 陈支平 1991，郑振满 2009，刘志伟

2010等)。对宗族以及村落研究的不同趋向,似乎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上的差异。从长远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话,关注点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家族和宗族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占据的重要性和深刻性相对地被削弱。但是,从最近的经验可以看到,家族和宗族在中国依然而且重新成为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资源。问题是过去的研究主要是把宗族或者村落看作一个单位,聚焦于此,对其历史过程和地域社会结构进行记叙型的研究。今后应该展开对国家理念和体制与地方社会的传统,宗族的战略选择引发的互动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和解释。

为此,我们需要重读弗里德曼(Freedman 1958, 1964)的研究。他是卓越的先驱者,综合分析了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宗族和社会史的相关资料和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宗族研究里的重要范式。后辈人类学者们通过各自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补充了他的假设的合理性。一些历史学家从他的研究作为理论基础的资料的正确性与否的角度批判他,从考证学的层次来看,反而使其后退。也有人用迁移及边疆理论,中原的宗族形成和之前已经在当地形成的宗族的例子,来批判弗里德曼的假设。这样就容易忽视弗里德曼把宗族的多种实践状况放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框架下来研究的理论性探索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往往关注一个社会制度通过多长的历史时间发展起来。相比之下,注重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人类学家更倾向于分析特定的社会脉络和环境那个社会制度所拥有的意义与功能。弗里德曼着眼于从中原迁移到东南部的人们历史背景,依据宗族的发展过程和其结构的特性,考察并揭示了他们如何在当地定居并确保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在政治上他们与近邻以及国家体系所结成的关系。他的具有先驱意义的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宗族,这个在地方社会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具有非对称性的多样性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多种关系的形成过程和现实的理论视角,也就是把宗族看作是说明由多样性构成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制度装置的视角。

我想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体制中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行为者的立场或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例如,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当代中国,通过宗族这个焦点来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的关系以及人民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又持有什么立场等等。通过对宗族组织与相关的传统文化的再生产的观察和分析,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由国家 and 人民实践的文化的政治,同时也可以理解作为构成社会的多种范畴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应由国家操作或者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过程和方法的“文化的政治学”。

人们把地域化的宗族(localized lineage)看作是在地域社会(根据情况,跨出地域的更大的地方社会)获得权力、文化和社会名誉的基础。政府在构建国家的绝对统治权的过程中,禁止并破坏了部分宗族组织。同时,为了把农民置于国家的统治下,也利用了宗族基础上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资源。人民自觉地根据现状,省查性地评价自己的传统,战略性地采取与国家多种形态的妥协与共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进入现代以后,宗族为何以多种形式形成回应或适应国家的理由(金光亿 1996, 1998, 2006等)。

在今天的中国汉族社会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对具有宗族复活性质的活动在增加的

现象，有着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国家主义角度，认为宗族复活是对革命、国家的文化性质的反动，因此对宗族复活做出否定型的价值判断。还有一点是从抵抗理论的角度，把宗族的有用性解释为，作为国家无法承担的个体经济与福利的资源开发的战略理论，或因市场经济与脱离集体化而引起的，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的社会经济资源。

召唤海外华侨资本和海外华人回访祖国，以扩张中国的国际联网等也被看作是适应在全球化时代，附应国家企图的一种政治经济活动，是国家与社会的共谋现象。因此，宗族的复兴以及宗族网络的扩散可以解释为，跨越国境、脱离国境和地域形成全球化的一种企图，即形成超越国家的网络社会和流动空间。城市化，城市空间，流动人口，移居，跨国移动等词汇不断在概念化，宗族的网络也被重新评价为新的、重要的并且有效的文化装置。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制造出新的想象中的国家，从那里引发出人民的感情和热情。宗族的文化复兴与再造现象可以用这种感情的政治学和想象的政治学框架解释为，中华的再造和引起对天下秩序怀恋的文化政治（Kim 2009）。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历史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复原等事业，与电视中的历史连续剧主旋律的变化，电影和音乐里红色记忆的再生产等文化现象的内涵意义等等，对上述的解释将成为人类学新研究领域，也是开拓宗族研究的新地平线。

但是宗族研究的主要背景并不只限于这种意识形态和体制改革过程。我们需要跨越这样的体制问题，注意到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儒教文明历史的复合型的国家社会，而且人类的制度和行为并不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这两点。何况，历史的记忆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承机制深深地嵌入（embedded）到没有亲身经历过的那些年代的人们，因此人们无法完全脱离历史意识和记忆。然而，尽管随着经济发展，即由于追求经济合理性，有人认为传统制度与文化体系将会消灭的前提，正如法拉尼（Polanyi 1944）所说的“整体性”，就像无法分离的东西一样，经济是有政治文化性的。

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相通的。我们也需要考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着地方的传统或者地方性所展开的竞合与妥协。“地方”与“人民”的传统的再生产不是对国家的抵抗，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共谋。这种共谋表面上看是图谋经济利益的合理性的手段，但从深层来看，它是由政治文化的欲望引起的，这种欲望是国家与人民可以各自拥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的生产与实践及其正当性的问题，应放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重新探讨。国家和人民这两个层次各自在进行着宗族文化的重建或宗族文化的现代发明，确立以儒教的价值观为基准的地方和人民的文化认同及其实践。人类学应该分析上述两个层次是如何调整、妥协、共谋的（金光亿 2001）。

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宗族组织的形态与活动虽然因地而异，但是从整体来看，人们在自己的力量无法承受强大和急剧扑来的国家权力面前，总是试图使宗族复兴，把宗族复兴作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空间的一种战略。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文化框架定义所经历的历史经验，希望把没有被国家认定为公共的历史记忆留作私人的历史，以他们的话语和方式记录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传授给下一代。并且，跨越由国家规定、管理和监督的现实世界的界限，构建他们自己的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再现与复兴同宗族相关的文化项目，在国内构建更广大的地域间的网络，东南亚、甚

至西方构建脱离国境或超越国家的网络空间。

所以，在谈论革命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下，国家和农民非公式地共谋，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再生产宗族。国家把宗族当作吸引海外华侨资本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认为宗族是确保中华文明主导权的文化资本。通过与国家共有所谓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等概念，农民可以把宗族当作跨越国家的干涉，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化世界的空间。

处于相对弱勢的农民通过宗族的可视化，想确认他们是有着自己的力量的存在。在这赋权（empowerment）过程中，他们把政府和国外华侨亲戚的介入，作为一个逆动过程来接受。这并不是政府单纯地、单方面地贬低和压迫人民的力量而得来，其中意义在于人民采取妥协和协商的方式，最终确保自己的声音和空间。

在当代中国，虽然国家展开的文化运动强调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和消除。过去的不符合现代性的概念和定义反而被包含在现代性的想象中，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此，宗族的概念及其相关的传统活动，以多种形式与经济发展并行发展的现象可以在上述文脉中得到解释。

5. 方法论上的问题

如上所述，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实践的现象非常具有魅力，也是重要的尝试。但实际上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这样的研究却伴随很多困难，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性引起的。有的学者把中国定义为法人化的国家（corporative nation-state），把广阔的领土维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里；让与多民族团体保持各自的势力的国家相比，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因素形成的想像的共同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共同体里存在着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团体和性质。因此我们需要分析谁来定义社会；国家如何分类、评价、定义社会和人民；人类学者所观察的社会和人民以何种地位存在；在市民社会的讨论中，主体是谁；话语的生产者又是谁；国家、知识分子、外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学者）、被称为农民知识分子的当地居民用什么视角发出声音，他们的声音形成了何种力量关系等等。

民族是被国家分类的又一个社会及人民的范畴。我们研究中国时，往往把国家视为由汉族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这里有意不使用“汉族”这个词，因为把中国叙述为由汉族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会使国家的官方层次中的中国—这个制度上的实际单位与汉族社会—这个理念或习惯性的概念里的单位发生混乱。因此，民族识别、民族间的文化接触与融合、国家的理念和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特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最后，讨论国家—社会关系时，把握“企图”是很重要的。如何把握政府（国家）的企图与人民的反应？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学者往往依靠知识分子、有的研究者还有政府的说明等来再现的人民的立场，这样的人民立场会变得很模糊。那么人民的心声只能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才能被掌握。可是，现今的中国要求学术的实用性，学术氛围由对当前的社会热点



照片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8年金光亿摄于北京

问题提供及时的诊断和解决方案的社会政策学所支配。在这种环境下，使得需要通过相对较长时间进行深入的、综合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被疏忽。而作为对策，人类学者们正在尝试着同时性的（simultaneous）、多地点（multi-sited）的参与观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成功地实现整体的、深层的人类学研究。

参考文献

金光亿

- 1993 “现代中国的民俗复活과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运动”『比较文化研究』1：199-227。
- 1996 “现代中国에서 国家和 社会의 关系：家和 宗族을 中心으로”『地域研究』5（1）：85-116。
- 1998 “现代中国 农村에서 共同体 理念의 基盤”『农村社会』8：130-160。
- 2000 『革命과 改革 속의 中国农民』서울：集文堂。
- 2005 『宗族과 民族：그 單一과 普遍의 神話를 넘어서』서울：아카넷。
- 2006 “现代 中国에서의 国家和 社会의 关系：宗族과 地域社会의 文化와 權力構造”『韓國文化人類學』39（2）：3-44。

（中文）

陈支平

- 1991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北京：三联书店。

刘志伟

- 2010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麻国庆

- 1999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

钱杭

- 1993 “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3期。

1994 “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
钱杭、谢维扬

1995 《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王铭铭

1997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

2004 《溪村家族》贵州人民出版社。

张小军

2004 《蓝田》北京：三联书店。

郑振满

2009 《乡族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

周大明等

2003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周大明

2006 《凤凰村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文)

韓敏編

2008 『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のアプローチ』東京：風響社。

聶莉莉

1992 『劉堡』東京：東京大出版会。

瀨川昌久

1996 『族譜——華南漢族の宗族・風水・移居』東京：風響社。

塚田誠之編

2008 『民族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中国南部における人類学・歴史学的研究』東京：風響社。

潘宏立

2002 『現代東南中国の漢族社会：閩南農村の宗族組織とその変容』東京：風響社。

(英文)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ised). London: Verso.

Cho, Mun-young

2010 “We are the State: An Entrepreneurial Mission to Serve the People in Harbin, Northeast China.” *Modern China* 37 (4): 422-55.

2013 *The Specter of “The People”: Urban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hen, A.

1983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Tavistock.

Davis & Harrell (eds.)

1993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kötter, F.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 Company.

Freedman, M.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 Friedman, S.
2006 *Intimate Politics: Marriage, the Market, and State Power in Southeast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o, M.
1999 *Gao Village*. London: Hurst & Co.
- Gladney, D. C.
1991 *Muslim Chine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M.
2001 *Social Change and Commun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韩敏 2007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
- Harrell, S. eds.
1995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Kim, K. O.
2008 "Reflections on China's Power." K. Lee et.al. eds. *Power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pp. 11-30.
- Kipnis, A.
1997 *Producing Guanx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Neoliberalism Reified: Suzhii Discourse and Trope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3: 383-400.
- Li, Z.
2001 *Strangers in th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tzinger, R. H.
2000 *Other Chin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R.
1984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eggler, E.
2001 *The Age of Wild Gho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rtner, S.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 126-166.
- Perry, E. and M. Selden eds.
2000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einhart.
- Potter, J. and S. Potter.
1990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Experience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ue, V.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u, H.
1989 *Agent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D.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der, A.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tson, R. ed.
1994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Yan Y.
1997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M.
1994 *Gifts, Favors,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注

- 1) 本研究受到了韩国研究财团 (KRFG 2009-342-B00022) 的资助。